



电商作为目前主流的购物方式之一,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但由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空白,监管存漏洞——

“便宜”假名牌在电商平台“猛卖”



■本报记者 吴锋思 通讯员 杨长平

近年来，我国网络零售市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据媒体统计，B2C(企业到用户的电子商务模式)在网络零售市场所占比重一路上升，2014年占比达到45.8%，交易规模超过1万亿元。然而，某些不良商家利用法律空白进行“售假卖假”，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其中，药品、服装、鞋、酒和生活用品成为“重灾区”。

组建制假“团队”卖假酒

“八八坑道”是台湾白酒市场主要领导品

牌之一。随着近年来两岸交流的深入，该品牌白酒在厦门地区乃至福建沿海地区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并积累了良好的市场美誉度。看到“八八坑道”的酒有很大的商机，厦门人陈某洋打起了歪主意，他在厦门市租了一处民房作为厂房，开始大量生产台湾“八八坑道”假酒，同时以第三方经销商的形式在一家知名电商平台上线销售，并陈列展销了38度、52度、58度等不同种类的白酒。为了保障销售渠道顺畅，陈某洋雇佣人员分工协作，以“分组”组建团队，成立了“采购小组”、“生产小组”和“运营小组”，分别负责假酒原材料的采购、分装、制作和线上销售。为了掩人耳目，陈某洋还在外地开办制酒公司，并在网络上提供真实可靠的注册地址，给消费者营造“正品”、“真货”的假象。后来，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发现陈某洋制假售假行为，并查获其假冒并企图用于销售的“八八坑道”高粱酒近两千瓶，共计价值46万余元。同时，公安人员还查获陈某洋用于制作假酒的包装纸盒、礼盒、瓶标等上万个。公安人员还在四川缴获假酒上万瓶，经鉴定，合计人民币270多万元。

近日，法院判决陈某洋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其他人员也获刑一年至两年不等。

“三人公司”卖出假货3000多万元

一家国际知名运动品牌的鞋类销售，在国际运动服装类别中一直处于三甲之列，这样的成绩让该品牌成为某些制假、贩

假不法分子的制售目标。

2011年9月，骆某伙同白某、丁某共同成立公司，并分别负责销售、财务和采购，同时租用厦门某仓库，主要销售假冒国际知名品牌的运动鞋。之后，骆某等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购进明知是假冒名牌的运动鞋，并将其销售给两家在国内赫赫有名的电商销售平台，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三千多万元。

在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公安人员抓获骆某等人，并从该公司及仓库查获贴有某知名品牌商标的运动鞋共计13472双，经鉴定，全部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合计价值为近百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予以销售，其中已销售金额为人民币三千多万元，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货值金额共计人民币九百多万元，均系数额巨大；被告人骆某、白某、丁某在公司实施犯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公司和骆某、白某、丁某的行为均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其中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是犯罪未遂。

近日，法院判决，该公司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骆某等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各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售假已经“规模化、组织化”

电商正逐渐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网

购已经是很多普通人首选的购物方式。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网购也成为司法纠纷的“重灾区”，其中又以售假贩假为主要问题。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2013年以来，该区法院就受理24件涉电商平台售假的刑事、民事案件，涉及某宝网、某某会等知名电商销售平台，而受害品牌包括耐克、金门高粱酒、斯伯丁篮球、金门一条根等各个领域的知名品牌。

记者注意到，在思明区法院受理的B2C电商“售假”纠纷中已经呈现出“地域化”、“规模化”、“组织化”特征。

“地域化”指的是，B2C电商的“售假”范围主要围绕假货来源地、制造地、贩卖地进行。

以鞋类为例，目前B2C电商“售假”多集中在鞋类品牌出口集中区——福建晋江、莆田等地。据分析，这可能与目前产业转型存在关系。目前，该地制造业生产设备齐全，劳动力资源丰富，大多企业出现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微薄的问题。因此，某些企业“铤而走险”，利用B2C平台“售假卖假”，以谋取高额利润。

“规模化”指的是，B2C电商的“售假”数量已成规模，涉案金额动辄以千万元计算。

同样以鞋类为例，在已审理的B2C电商销售假鞋案中，有在某宝网销售假冒“匡威”鞋达4000余万元，也有在“某某会”、“某鞋库”上销售假冒“耐克”鞋达3000余万元。据分析，B2C电商上销售的假名牌多以“低价便宜”为卖点，迎合了大众对“名牌”趋之若鹜

的消费需求。不法商家正是利用部分消费者的不良心理和电商渠道的便利性，有针对性地“售假卖假”，导致假货泛滥。

“组织化”指的是，B2C电商的“售假”团队已有清晰组织架构，团队分工明确，成员分别负责生产、采购、销售、物流、财务等。“售假”团队甚至利用B2C电商平台搭建地区分销体系，销售范围遍及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据了解，B2C电商“售假”成泛滥之势与其经营模式有直接关系。目前，多数B2C电商采用“自营+平台”的经营模式。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为了吸引消费者，部分B2C电商在选择供应商和进驻商家时，往往放松检验，导致其对于第三方商户的质量难以把控。

同时，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空白，监督执法失位，导致B2C电商“售假”的违法成本相对较低。目前，对于绝大多数售假的B2C电商，国内并没有相关法律约束。一旦发现销售侵权商品、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经营行为，执法部门只能依据《产品质量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与违法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相比，处罚的震慑力有限。

另外，政府机构对B2C电商一般仅审查其网络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对具体销售的商品的许可文件和实际销售货物审查不严，即便有要求品牌销售许可，一般均未严格要求批次一一对应，而监督缺失也间接“鼓励”了B2C电商的“售假”行为。

图片来自：BOWN.COM

- 单位分的福利房，是谁的福利就由谁独享吗？
- 保障房的购买资格，别的家庭成员能继承吗？
- 一家人盖的共建房，没参与建房者能分享吗？

“特殊房屋”该如何继承

■ 江鹏程

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房屋由谁继承成了不少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尤其是对于单位分配的福利房、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以及在宅基地上建的“共建房”等特殊房产的继承问题，更是因为其本身的法律关系复杂而让继承纠纷更加难解。可是，难解法官也要一一化解。面对这些“特殊房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福利房：谁的福利就该分给谁吗？

福利分房是特殊时期的房屋取得形式，更是一些单位给职工提供的一项主要福利。1989年8月，王清单位开始出台分配福利房屋的文件，以每平方米520元的价格出售单位的房屋。当时的王清根本无力负担几万元的房款。好在单位里大家经济条件差不多，所以房屋一直未能分完，而王清在积极筹钱的基础上报名参加分配，占据了单位房屋分配的优先权。

在王清凑钱的过程中，认识了丧偶的单亲母亲张芳。由于互相产生了好感，且王清觉得两个人筹钱更有助于自己早日买上新房，于是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就登记结婚了。1991年底，王清凑齐了三万余元购买了单位的一套福利房，并将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王清与张芳带着张芳10岁的孩子张松一起

搬进了新房。

2011年，张芳因病死亡，张松起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母亲张芳的遗产份额，对房屋进行重新分配。王清表示房子是自己福利分房所得，属于个人财产，不同意张松的诉请。

解析：分房福利的获得与分房人的身份密不可分。所以很多产权人认为房屋的产权专属于自己。但实际上，我国婚姻法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房屋等不动产的产权认定主要基于房屋取得的时间是在婚前还是婚后这一特定时间进行判定，对房屋产权的性质并无明确要求。

具体到本案来看，虽然王清单位在1989年就开始了福利分房，但此时王清由于经济原因并未购房，而是在与张芳结婚近一年后才购买房屋，房屋产权的取得已经在婚后，所以对于该福利房屋张芳应该具有相应的产权份额。所以，张松应该和王清、还有张芳的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一起继承张芳的房屋份额。

两限房：家属能继承购房资格吗？

限价房、限地价的“两限”商品房已经成为不少城市“夹心层”的一个好选择。2011年，王平幸运地获得了当地限价房的购房资格，房价仅是周边房屋均价的70%。

为了抓住这个好机会，王平立即与房产商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并按照规定方要求支付了定金及购房款。

天有不测风云，在房屋产权登记之前，王平却因车祸丧生。王平之子王欢在处理王平的后事时被房产公司告知：王平因为不可抗力死亡，双方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所以王欢可以领回王平支付的相应价款。

从王平购房时间算起，周边的房价又在持续上涨。王欢认为，自己作为父亲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有权继承父亲的购房资格，自己可以代替父亲履行该限价房屋预售合同，所以起诉到法院要求房产公司继续履行过户手续。

解析：限价商品房是具有很强的人身属性的房屋，是国家给予某一特定群体购房的优惠政策，不具有普惠的性质。实践中，各地对于购买限价房的资格均有严格的限定。包括个人收入和无房证明等条件限制。而且在限价房资格的获取时也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很多购房人资格是通过摇号的方式获取。

本案中，王平是以个人身份申请限价房资格并获得批准，在此过程中，王欢并非该房产的共同申请人，所以该房屋购买资格仅专属于王平。实际上，如果以王平父子两人名义共同申请，两个人的收入情况和产权证证明都可能不符合限价房的资格要求，无法取得购房资格。所以法院最后认定，王欢无权继承该购房资格。

共建房：给家人做饭能分房产吗？

在农村宅基地上建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农民居住房屋最重要的房屋来源。1988



年，王武与杨秀夫妻俩就曾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了房子。建房时，儿子王晨与女儿王丽都已成年。

为了让房子盖得快些，建房时一家四口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王晨帮助父亲一起盖房、杨秀负责采购原料、王丽负责做饭。经过家人一年多的努力，六间房屋拔地而起。

房屋建成后，王晨与王丽相继结婚。在王武看来，自己的房子以后肯定要留给儿子和儿媳，为了补偿女儿王丽，王武许诺给王丽置办了一笔丰厚的嫁妆。未曾想由此引发了姑嫂之间的矛盾。为了防止日后财产分配出现问题，王武夫妻留下遗嘱，将六间房屋留给儿子和儿媳继承。

二老去世后，王丽一怒之下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自己的房产份额。

解析：在农村，很多人认为只有在家庭建房时候出钱或者亲自参加劳动，才叫做法律上的“出力”，才有资格分享房产。而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成员只要在建房时已经成年且具有相应的劳动能力，就视为其在建房过程中出过、出力。除非对方有充分的证据予以否认。例如，在建房时某成员正好在外

地工作且并未对家庭进行资助或者因刑事犯罪被剥夺人身自由等情况。

从本案来看，王武与杨秀夫妻俩以遗嘱的形式处分自己的财产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建房过程中，王丽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王丽仅仅是通过做饭的形式完成相应的“后勤保障”，但这却解决了王武等三人的后顾之忧，也是对建房这一“家庭工程”的分担，应视为对于房屋建造出资出力。所以法官在综合王家人建房时贡献大小后进行酌情分配，将南侧中间房判为王丽所有，其余归哥哥王晨所有。（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断的是轴缺的是法？

“任何人不能因自己的过错而获益”！汽车厂商处于绝对的技术优势地位，具有普通人无法达到的证据获取能力，当纠纷双方的举证能力差别悬殊时，应当通过公正的程序规则来实现实质正义。

■ 金宏伟

近年来，汽车断轴事件频发，而不少因断轴展开维权的车主，却依然艰难地“走在路上”。几年时间里，断轴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像传染病一样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身上。曾有汽车专业人士接受北京交通台《汽车江湖》栏目采访时表示，各厂商之所以尚未对相关车辆予以召回，主要原因是质检部门还没有查明断轴的原因。

乍听起来，这个理由似乎很有道理，问题没查清楚，厂商当然可以不召回；但笔者忽然想起，某品牌车辆在美国发生刹车故障的时候，美国的政府部门也没有查明汽车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但是该品牌车辆为什么在美国就能被大规模召回了呢？关键就在于法律规定的不同。

先说举证。汽车有问题，需要车主或者政府花钱去查明原因吗？欧美一些国家的

法律告诉我们，不需要。汽车有问题，厂商就要说明问题出在哪里，说不清楚又无法杜绝问题的，那就先别卖了。用法律上的理论来讲，汽车厂商处于绝对的技术优势地位，具有普通人无法达到的证据获取能力，当纠纷双方的举证能力差别悬殊的时候，应当通过公正的程序规则来实现实质正义，在社会利益集团与个体利益保护的平衡中更加侧重保护弱者的权益。我们还是以某品牌车在美国发生刹车故障为例——车出现问题，厂商总裁就要接受公开质询，说不清问题在哪里，那就算厂商有错，就得向消费者赔钱。

接着再说赔偿。大家应该知道，汽车生产厂商在美国稍微出点问题就可能面临高额惩罚性判决。为什么？哈佛大学教授桑德爾在《公正》一书中讲述的真实案例可以解释。Pinto曾是福特汽车公司推向市场的一

款小型车，当时十分受欢迎，但它的油箱设计却有缺陷，很容易爆炸。事实上，确实有不少人因驾驶Pinto而被炸死，还有一些人严重受伤。于是福特公司被告上法院。结果人们发现，福特公司早就知道Pinto的设计问题，福特还专门做过一项成本收益分析，然后发现，Pinto车上每增加一个零件，成本就要增加11美元。如果这么做，总计1250万辆车，共要花费1.37亿美元才能让这款车更安全。不过他们还计算了另一种情况，按照故障发生率，pinto可能最多造成180个人死亡，即使每个死者可分到20万美元赔偿，外加上还有180人受伤，每人赔偿6万美元；再加上公司需要更换约2000辆车，每辆700美元的维修费用，全部费用加起来，约4950万美元。如此，根据这份成本收益分析，福特公司最终决定，不为Pinto车的油箱安装保护装置，就等着谁死谁告，

再赔钱。福特的这种将生命量化的做法一经披露便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最终导致美国立法通过了高额惩罚性赔偿制度，目的就是预防福特公司这样的行为，要让所有的厂商一旦被发现有故意隐瞒产品故障就被罚个底儿掉，让它们得不偿失，再不敢做出等着死人的恶行。

我国当下正在不断完善法治建设。如果我们的法律同样引入高额惩罚性赔偿制度，相信可以大幅度减少断轴事故的发生。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不时发生断轴事故，却鲜见厂商对相关车辆予以召回。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就是，反正车主无法证明断轴的原因，即便将来有一天政府部门找到原因，相关车辆也早就大卖特卖了，到时再从利润里拿出九牛一毛，赔给那些坚持告状的，最终厂商还是赚得盆满钵满。

“任何人不能因自己的过错而获益”，这

是自罗马法时代就已经确立的一条法律原则。当断轴已经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法律依旧允许汽车厂商优哉游哉地继续销售，同时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让老百姓见证断轴发生的原因，甚至即便将来找到了故障原因也只需赔偿数额有限的一点钱，那么就是在纵容厂商利用自己的冷血和不道德来赚钱。这显然是非正义的。当我们在汽车生产和制造上不断学习和靠近欧美发达国家时，为汽车业立法或许才更是一个需要学习并借鉴先进经验的领域！

（作者为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将试点行政争议适用调解

据新华社电（记者马梦达 梁天韵）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了解到，《北京市行政调解办法》将于9月1日起施行，规定涉及行政赔偿、补偿、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三类行政争议的案件，可通过行政调解解决。

北京市法制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富莹表示，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一般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种方式。其中行政调解就是由行政机关作为调解主体化解处理争议纠纷。近几年，随着矛盾纠纷越来越多，法院诉讼被推向第一线，行政调解反而退居第二线。在此背景之下，有必要将行政调解手段利用起来。

北京从2011年已开始全面启动行政调解，2014年全市行政机关共受理行政调解案件302730件，调解成功236129件，成功率为78%。

为尽量在前端化解矛盾争议，《办法》将这三类争议的调解适当前移，规定对这三类争议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在复议机关作出决定或者法院作出裁判之前，行政机关在复议机关、法院的指导下可以进行调解。

《办法》同时规定，调解行政争议的处理期限，应当在自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结束。

云南成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研）云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20日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由专门委员和专家委员组成，15名委员中，只有2名委员来自法检系统，社会各界代表比例高达86.6%。

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李建阳介绍，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是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相配套的一项改革内容。为体现遴选委员会的广泛代表性，云南省规定社会各界代表比例应不低于50%。据此，云南省成立了由15名委员组成的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其中，7名为专门委员，由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人大、省政协及省法、检两院推荐产生，代表相关部门；8名为专家委员，由法学学者、资深法律工作者等具有较高法律专业素质的人士和部分社会人士构成。

记者了解到，云南是全国第二批11个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之一，云南省委确定昆明市、普洱市为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



南京警方“传销清剿”抓获700余人

8月20日，在南京桥北天润城临时设置的警戒区域内，警察将传销人员集中，准备带离现场。

当天，南京市公安局发动大规模针对传销组织的现场清剿行动，抓获700余名传销人员，捣毁51个传销“经理室”，同步控制传销组织银行账户8个，资金千余万元。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